

文章编号:2095-0365(2022)01-0072-08

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

田玉芳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之后,成为中国联通欧亚的重要陆上通道,大量的唐人西北边塞诗全景呈现了丝路东段沿线甘肃各地的地理景观等的基本风貌,全面记录了甘肃大地的戈壁大漠、名山大川、独特气候、特有物产等。同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处于丝路东段沿线的甘肃,在唐人边塞诗中就集中体现了此地多民族和谐共存、多元饮食娱乐文化生活繁荣、边塞尚武风气盛行等突出特征,凸显了独具甘肃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

关键词:丝绸之路;唐人边塞诗;甘肃;书写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2.01.12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以后,便成为中国联通欧亚的重要陆上通道,至于唐,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更加频繁,丝绸之路迎来了更大的繁荣,形成了民族、文化、经贸大融合的盛况,《新唐书·西域传下》云:“西方之戎,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浸多。唐兴,以次脩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已勤矣!”^{[2]6264} 唐帝国以强大的国家自信,广纳华夷的非凡气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造就了空前的帝国盛世。

唐代丝绸之路东段贯穿河西、陇右二道,覆盖今甘肃全境,河陇二道当时甚是富庶,据《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载:“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当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缿帛为军资,开屯田以供糗粮,设牧监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3]7265} 河西、陇右地域辽阔,是唐朝联通西域的门户,二道在甘肃境内辖地多为丝路重镇,雄关名山多为丝路要塞,均为丝绸之路边塞诗中常见的地理意象。此外,大

量的唐人边塞诗全景呈现了丝路东段沿线甘肃各地的地理景观、人文风情、民风民俗等基本风貌,集中展现了甘肃独特的地理人文风情,对于进一步研究甘肃独特的地域文化大有帮助,因而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尤为必要。今笔者以《全唐诗》为文献依据,结合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在详研唐人边塞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一、唐人边塞诗之甘肃地理景观书写

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独特的边塞风光使出塞唐人赞叹不已,他们在诗中反复描绘着戈壁大漠、白草黄沙、名山雄关,因此,表现甘肃独特地理风貌、边塞风物的作品是唐人边塞诗中的重要部分。

(一)以白草黄沙为典型特征的甘肃河西大漠风光书写

甘肃河西戈壁大漠、白草黄沙的丝路风光,引

收稿日期:2021-06-21

基金项目:2016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唐代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与丝绸之路的文化关联研究”(YB064);
甘肃省高校2019年度创新能力提升项目——“唐代传奇小说中的甘肃人文意象研究”(2019B-094)

作者简介:田玉芳(1981-),女,兰州财经大学商务传媒学院讲师,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本文信息:田玉芳.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书写[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1):72-78,103.

得见惯秦中花鸟的诗人不断吟咏,其中以王之涣《凉州词》^{[4]186}——“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一联最为典型,不仅生动展现了凉州城外黄沙莽莽的情状,大漠风光的描写也是古往今来河西走廊瀚海风景的鲜活记录。

以上场景描写在唐人边塞诗中不在少数,盛唐诗人李昂《从军行》^{[4]1209}云:“汉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间。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横闭玉门关”,诗中的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地处河西,乃丝路要塞,是西汉时期的战略要地,诗中描绘的“黄沙遍野的边塞风景是唐为西拒吐蕃以保障丝路畅通而驻扎此地的唐军日常所见。这种场景在亲至河西的诗人眼里更是常见,如王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监察御史出塞,行经焉支山作《燕支行》^{[4]1257},便有“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之语,描写焉支山下的滚滚黄沙;其《送刘司直赴安西》^{[4]1271}亦云“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可见沙尘漫天是丝路要塞阳关的典型风景;而其《使至塞上》^{[4]1279}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以恢弘的气势描绘了甘肃河西大漠雄浑壮阔的风光,可说是唐人边塞诗描写甘肃大漠风光的代表。而白草往往伴随大漠出现,王维《出塞》^{[4]184}有“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语,白草是沙漠中常见的芨芨草,因干枯时呈白色故名白草,白草适合在极端缺水和寒冷的地方生长,生命力极强,而今甘肃大地仍随处可见。曾两次亲临甘肃,频繁往来于丝路的诗人岑参书写河西的诗中,“白草”“黄沙”可谓无处不在,如《玉门关盖将军歌》^{[4]2059}之“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敦煌太守后庭歌》^{[4]2056}之“黄沙碛里人种田”、《过燕支寄杜位》^{[4]2104}之“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句、《过酒泉,忆杜陵别业》^{[4]2090}之“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都是河西遍地黄沙白草的描绘,可见此种景象给岑参留下的印象之深。地处丝路的甘肃这种迥异风景给诗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因此,即便是不大关注景物的高适,在河西节度使府掌书记任上作《送浑将军出塞》^{[4]2219}诗,写到焉支山亦云“黄云白草无前后”,可以说,“黄沙”“白草”是亲临此地的唐人关于甘肃河西的诗中最为常见的景象,这种影响直到中晚唐诗人笔下也有体现,张籍《凉州词》^{[4]381}、王建《凉州行》^{[4]3374}、皎然《塞下曲》^{[4]9241}都是以白草黄沙为典型意象来描写甘肃风景的。

(二)以燕支、祁连为代表的甘肃壮美山川书写

自西汉以来,地处丝路要道的甘肃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河西地区,更是中央朝廷与周边部族鏖兵的主战场,于是横亘在此地的名山便成了战争双方的天然屏障,因此这些名山不仅频频出现在史书中,也是诗人笔下所常见的。

上文提到的焉支山(燕支山)最负盛名。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军突袭焉支山,使匈奴昆邪王部退出河西走廊,从此丝绸之路甘肃段成为坦途,焉支山也成为驱除胡虏的象征。至隋大业年间,西域各部纷纷遣使前往河西地区从事贸易,隋朝也曾派官员前去张掖主持相互贸易及文化交流等事宜,隋炀帝十分重视丝绸之路,为解决吐谷浑侵扰,保障丝路畅通,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大宴西域诸部,此次西巡基本肃清了丝路障碍,为丝路贸易在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此次盛会也使焉支山声名远播。唐时焉支山属甘州张掖郡辖,是丝路要道,唐人边塞诗对焉支山的书写很多,以李白最为典型。祖籍陇西的李白虽生平未到过陇右,却有不少关涉焉支山的诗,李白此类诗多以霍去病扬名焉支山之典凸显其边塞情怀,其《幽州胡马客歌》^{[4]200}有“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的豪语,表现戍边将士不惧苦寒、戍边杀敌的英雄情怀,此处的“燕支山”就是驱除外敌的象征;《塞上曲》^{[4]1701}有“燕支落汉家,妇女无颜色”之语,同样是用霍去病夺取焉支山之典,表现立功边塞情怀;其他如《代赠远》^{[4]1880}《王昭君》^{[4]1691}《秋思》^{[4]1710}均语及焉支,都是以焉支山为意象凸显诗的边塞主题。亲赴河西的王维曾作《燕支行》^{[4]1257},也是借用霍去病、焉支山的典故,塑造了雄才大略的主将形象,抒发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安定西陲的豪情。值得注意的是,亲临此地的岑参、高适二人诗中的焉支山,则多以实写为主,以展现诗人在丝路沿线的见闻。如岑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4]2059}云:“花门南,燕支北,张掖城头云正黑”,《过燕支寄杜位》^{[4]2104}云:“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两首诗既有焉支山的边塞风光描写,也有对山雨欲来的战争气氛的渲染。再如高适《登百丈峰》^{[4]2204}云:“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送李侍御赴安西》^{[4]2230}云:“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送浑将军出塞》^{[4]2219}云:“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

下”,三首诗通过高适对焉支山的关注,见出此山在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战略位置。

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覆盖,唐人又称“雪山”,王昌龄《从军行》^{[4]1444}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千古名句,便是对雄浑壮美祁连山的描绘。祁连山脉绵长,为地处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酒泉等地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故汉唐两朝,西塞战争多发生在祁连一带。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致使安西四镇沦陷,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唐朝派军征讨,骆宾王随行,作《从军中行路难》^{[4]833},其二便有“长驱万里誓祁连”之语,可见祁连山在此次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而《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亦载,唐开元十六年(728),“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3]6902},可见直至盛唐,唐蕃之间的祁连山之争仍未平息。另外,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4]2090}亦云“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则知祁连山脚下的祁连城是唐代丝绸之路上往通酒泉的必经之路。到了晚唐,虽然河西诸郡陷落,丝绸之路中断,然而诗人们对于祁连山的关注仍时见笔端,马戴《送和北虏使》^{[4]6449}云:“穹庐移斥候,烽火绝祁连”,就表达了渴望祁连山一带和平的愿望。

总的来说,唐人边塞诗中的甘肃名山,基本都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战略要塞,而诗人们通常是借用相关历史典故以抒怀抱,多以虚写为主,只有个别亲临当地的诗人(如高岑)笔下有对地理景观的实写,但不多见。可见到了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名山以其具有特定指向性的边塞特征和丝路文化内涵,成为典型的文学意象而存在于唐人的诗中,而这些典型意象,对于此后历代文人的边塞诗创作有很大影响,后人的边塞诗特别是西北边塞诗中,此类意象多见,“焉支”“祁连”与“玉关”“阳关”等典型意象一起成为边塞诗的象征。

(三)水寒风刀的苦寒气候书写

丝路沿线的甘肃大地特别是河西地区,气候相对寒冷,这种认识即使在未出塞的初唐诗人笔下也有记录,“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赠苏味道》^{[4]738}就有“北地寒应苦”之语,诗中的北地乃唐时的宁州,治所在今甘肃东部的宁县,距长安仅两百多公里,气候虽比河西暖和,却仍比长安寒冷。

随着出塞诗人日渐增多,到了盛唐,对甘肃段寒冷天气的感受更多地出现在唐人笔下,王之涣的名作《凉州词》^{[4]186}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便是对丝路要塞玉门关苦寒的喟叹。而王翰《凉州词》^{[4]1605}其二更云“秦中花鸟已应阑,塞外风沙犹自寒”,直接将关内与边塞的气候作对比,以凸显丝路都会凉州的寒冷,这种写法在岑参的诗中很典型,其《河西春暮忆秦中》^{[4]2089}云:“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把渭北与凉州的天气冷暖作对比,《登凉州尹台寺》^{[4]2085}亦云:“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复言凉州春天的珊珊来迟,都是诗人对甘肃苦寒天气不适应的体现。王昌龄《望临洮》^{[4]1420}(一名《塞下曲》)前两联云:“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临洮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丝路东段的南线、中线都要经临洮后改道西行,此诗描写的正是诗人随军度过寒冷的洮河水,在大漠之中回望暮霭沉沉的临洮城,寒冷天气的切身体会之书写;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4]1271}也有“三春时有雁,万里少人行”之语,可见本应初春北飞的大雁,在阳关只有在暮春偶见,可见此地之寒。中唐诗人长孙佐辅《陇西行》^{[4]240}更云:“阴云凝朔气,陇上正飞雪。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人寒指欲堕,马冻蹄亦裂。射雁旋充饥,斧冰还止渴”,将陇上苦寒天气渲染到了极致。

(四)以鸚鵡、麝香为代表的甘肃特有物产书写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云:“是时(天宝十三载)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阡陌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3]7038}唐时甘肃富庶,人烟稠密、农业发达,还有很多如葡萄、苜蓿、甘草、鸚鵡、麝香、龙须席、麸金、土拨鼠之类的土产,其中的葡萄、苜蓿等都是张骞凿空后经丝绸之路自西域传入,这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多有记载,在唐人诗中也有展现。

甘肃盛产葡萄、苜蓿、甘草,在唐人边塞诗中广有记载。如杜甫在秦州所作《寓目》^{[10]602}首联云:“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是对陇右盛产葡萄和苜蓿的书写。葡萄自西汉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以来,在陇右多有种植,《杜诗详注》^{[10]603}引《永徽图经》注云:“葡萄生陇右、五原、敦煌山谷,今处处有之,其实有紫白二种。”(如今甘肃河西地区的

葡萄种植仍然非常广泛);《新唐书·地理志》^{[2]1043}记载,岷州和政郡特产甘草,晚唐贯休《古塞上曲》^{[4]9364}其五云:“赤落蒲桃叶,香微甘草花。不堪登陇望,白日又西斜。”《塞上曲》^{[4]9315}其一云:“锦袷胡儿黑如漆,骑羊上冰如箭疾。蒲萄酒白雕腊红,苜蓿根甜沙鼠出”,其中的葡萄(蒲桃)、甘草、苜蓿,都是对甘肃土产的书写。

其他陇上物产如鸚鵡、麝香等,也多见于唐人诗:早在盛唐时期,岑参出塞经金城(今甘肃兰州),作《题金城临河驿楼》^{[4]2089},诗中就有“庭树巢鸚鵡,园花隐麝香”语,说明此地产鸚鵡、麝香,《新唐书·地理志四》亦云:“兰州金城郡,下,以皋兰山名州,土贡:麸金、麝香、鼯鼠。”^{[2]1042}岑参另有《赴北庭度陇思家》^{[4]2106}复言“陇山鸚鵡能言语”,可见陇上产鸚鵡在诗人印象之深刻。肃宗乾元初年,杜甫游览秦州麦积山作《山寺》^{[10]603},也道“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更印证了史书的记载。至于晚唐,客游陇右的诗人许棠作《陇上书事》^{[4]6970},在描写陇上风景时道“树飞鸚鵡众,川下鹤鸰疏”,绘制出鸚鵡绕树群飞的边城景象。可以说,甘肃盛产鸚鵡的印象深植于唐人脑海中,即便是没出塞的诗人涉鸚鵡,也总与陇上有关,白居易《鸚鵡》^{[4]5035}、元稹《大觜乌》^{[4]4454}、杜牧《鸚鵡》^{[4]5973}、皮日休《哀陇民》^{[4]7021}等均是如此,这类作品不胜枚举。

二、唐人边塞诗之甘肃人文风情书写

唐时的甘肃既是西北边防要塞,也是丝路咽喉,丝路的畅通、商旅人物的往来、各种文化的交流,极大地开拓了此地唐人的视野,大量的异域物产、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的涌入,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绚烂的色彩,这些都写入了唐人的边塞诗中。

(一)多民族混居的民族融合生活画卷书写

甘肃自古为羌戎之地,特别是河西地区,秦汉之际尝为西北少数民族部族占领,胡汉杂居的历史悠久,十六国时期以凉州为中心的后凉、北凉、南凉3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建立,使杂居现象更为突出。到了唐朝,国力的繁盛、丝路的繁荣引得周边部族竞相来归,大量来自西域的胡人在河西杂居,对本地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丝路都会凉州胡汉杂居现象最为突出。据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考证,聚居凉州的胡人以昭武九姓为主^{[7]17-32},大多是经丝绸之路通商流入,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定居凉州后与当地汉族百姓和谐共处,在丝绸之路的通商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胡汉杂居的现象被写入盛唐人的诗作中,诗人李颀曾作《听安万善吹觱篥歌》^{[4]1354},言音乐家安万善为“凉州胡人”,实际上安万善就是昭武九姓之安氏后人。天宝年间岑参经凉州,亲身体会了此地多民族混居的状况,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4]2055},诗云“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盛唐时凉州人烟稠密、胡汉杂居的情形;其《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4]2055}有“羌儿胡雏齐唱歌”语,亦可见酒泉的羌胡人民与汉人和谐共处的场景。到了中唐,李端《胡腾儿》^{[4]3238}的主人公——“身是凉州儿”的胡腾儿,不仅生得“肌肤如玉鼻如锥”(具有典型的西域少数民族的长相特征),而且能“作本音语”(本民族语言),亦可证凉州住着不少西域胡人;李端另有《赠康洽》^{[4]3238}一诗云“黄须康兄酒泉客”,黄须是典型的西域胡人面貌,酒泉而康姓,则知康洽乃寓居酒泉的康氏后人(唐时康国人来中国,多以康为姓)^{[7]18};与李端同时的戴叔伦也有《赠康老人洽》^{[4]3112}一诗,称洽为“酒泉布衣旧才子”,也可佐证康洽寄居酒泉的事实。除了诗中所见凉州典型胡人姓氏而外,其他也有相关记载,如白居易《西凉伎》^{[4]4701}有胡人寓居凉州的描写——“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紫髯深目”的胡儿在凉州未陷落吐蕃时来到长安,证明了盛唐时凉州胡汉杂居的情状。河西陷落吐蕃后,虽然丝绸之路中断,然而杂居现象更为普遍,耿漳《凉州词》^{[4]381}之“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描绘的正是大量吐蕃人涌入凉州后的生活图景。实际上,地处甘肃东南部的秦州胡汉杂居现象也很常见,乾元初年杜甫至秦州所作诗中,就有不少此地羌胡杂居的记录,其《秦州杂诗》^{[10]575}其三有感于此地外族比重之大,发出了“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的喟叹,可见本土居民仅万家,内附的降虏却有几千帐之多;其十之“羌童看渭水”^{[10]581}语,其《寓目》之“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10]602},《日暮》之“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10]619},都是受丝路影响秦州多民族和谐共存生活的写照。

(二)多元化的饮食、日常文化生活与地方风习书写

唐朝强盛的国力、博大的胸襟与开阔的文化视野,再加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氛围,胡汉混居加速了胡风胡俗的广为流传,胡食、胡妆、胡服成为时尚,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元绚烂的文化氛围,这些都使得地处丝路沿线的甘肃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带有了浓郁的多元色彩。

1. 独具地方特色的多元饮食文化书写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翰著名的《凉州词》^{[4]1605}生动地点出了以凉州为代表的河西人民对于葡萄酒的喜爱。葡萄自张骞凿空引入中原后,甘肃各地已多有种植,而葡萄酒酿制工艺则是唐初传入,贞观年间高昌国开始向唐朝进贡葡萄酒,太宗灭高昌后,葡萄酒酿造工艺经丝路传入中土,《唐会要》卷一百载:“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14]2135}此后,新品种的葡萄和葡萄酒开始在中原盛行,而凉州是新兴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地,据唐李浚《松窗杂录》载:“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16]1213},则知玄宗朝时凉州葡萄酒已是宫廷宴饮的御用饮品。作为产地,河西人民饮用葡萄酒的热情更加浓烈,岑参经酒泉曾作《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4]2055}就有“交河美酒归叵罗”之句来咏葡萄酒;元稹《西凉伎》^{[4]4616}更是直言“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将凉州作为丝路都会的繁华盛景,以及人们对葡萄美酒的喜爱鲜活地展现出来。

除了嗜饮葡萄酒外,唐时驻守河西地区官员们还有吃骆驼肉的习惯。骆驼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经丝路引入中原,一直都作载重之用。唐朝再通丝绸之路后,对骆驼的需求大大增加,曾在陇右等地大量牧养。杜甫在秦州时作《寓目》^{[10]602}诗就有“胡儿掣骆驼”语,可见肃宗乾元年间骆驼在秦州是比较常见的。骆驼肉可以食用,在牧养骆驼且胡风较盛的陇右,食驼肉较其他地方更为常见。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4]2059}云“金钗乱点野酩酊”,《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4]2055}亦云“浑炙犁牛烹野驼”,都是关于宴饮集会上众人分食驼肉的记录。

事实上,唐时甘肃人民的生活习惯保存至今,如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带仍然是葡萄和葡萄酒的主产区,而且人们还保留着吃驼肉的习惯,丝绸之路以及大唐文化的影响之巨可见一斑。

2. 多民族特色的乐舞文化生活书写

唐立国至太宗贞观年间,经丝绸之路自西域传入的乐器如琵琶、箜篌、箏(鬲)篥、羯鼓等空前流行。唐乐在隋制九部乐的基础上收高昌乐,形成了以西域音乐为主的十部乐,而以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的雅好与提倡,极大地推动了音乐的发展与普及,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乐舞流行的风尚。

受此风习影响,处于丝路沿线的甘肃一带,乐舞文化的胡化痕迹很是突出,凉州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谢赫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道:“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风格。”^{[15]38}关于这一点岑参的诗最能说明问题,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4]2055}云“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便可见此地以琵琶为代表的胡人胡乐的流行情况;其《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4]2055}复云“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诗中的鼓(羯鼓)、琵琶均自西域传入,长笛乃出自羌族的羌笛,宴会上羌儿、胡雏和着胡乐歌唱,展现了酒泉胡人乐师与胡乐盛行的情况;其《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此曲本出北同城)》^{[4]2057}复云“琵琶横笛和未匝”,也可看到琵琶和羌笛的身影,另外此诗中的美人舞乃西域舞种——胡旋舞,胡旋舞伴奏音乐节奏明快,诗人还将胡乐和中原乐曲做了比较,认为“胡人传入汉”胡旋曲远胜中原音乐,高度肯定了胡乐的艺术成就。高适亦有《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4]2243}诗,云“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也是关于玉门关上胡人吹羌笛的书写。由高岑的诗,可知受丝路文化影响,盛唐时期西域音乐及乐器在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地区的流传情况。

配合音乐的兴盛,各种舞蹈也广为盛行。唐朝舞蹈有健舞、软舞之分,甘肃地处边塞,尚武气息浓厚,人多喜健舞,上文之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4]2057}中“莲花北铎舞”就是胡旋舞。胡旋舞来自西域康国(今新疆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在盛唐风行一时,据说杨贵妃、安禄山都是胡旋舞的行家里手,此舞在河西

也流行。此外还有胡腾舞,胡腾舞来自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唐时善舞胡腾的多为来自石国寓居河西的胡人,如李端《胡腾儿》^{[4]3238}开篇便云“胡腾身是凉州儿”,即点明了胡腾儿的身份;元稹《西凉伎》^{[4]4616}在讲到哥舒翰在凉州广开筵席时云:“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可见凉州有舞胡腾的风尚。除了胡腾舞之外,狮子舞在甘肃河西也比较流行。狮子舞是一种源自天竺(古代印度)与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大型假面歌舞,经丝绸之路传入。《通典·乐六》载:“太平乐,亦称五方狮子舞,狮子挚兽,出於西南夷天竺、狮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扑以从之,服饰皆作崑崙象。”^{[17]3718}高适所作《九曲词》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收复河曲,其二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13]162},诗中的“舞绣骐驎”实际上就是狮子舞的传入中土后的变种。上文中元稹《西凉伎》中已涉及狮子舞,白居易《西凉伎》^{[4]4701}亦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元白同题诗中的胡人狮子舞者均来自凉州,便知甘肃河西有舞狮子舞的风尚。此外,通过丝路传来的百戏在凉州地区也常见。仍以元稹《西凉伎》为例,诗就有“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的描写,可想见当时百戏杂耍的情状。相应的甘肃河东地区也有胡舞的习惯,杜甫《秦州杂诗》^{[10]574}其三云“胡舞白题斜”,白题斜是西北少数民族舞蹈的代称,此句便是秦州受丝路文化影响流行胡舞的写照。

3. 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独具特色的日常生活方式与边塞风习书写

自古以来,甘肃人民都以农耕生活为主,开元年间王维《凉州郊外游望》^{[4]1278}中关于凉州人民祭祀主司农业生产的田神之描写,就可见一斑。随着丝绸之路上中亚游牧民族各色人物往来频繁,再加上吐蕃、西突厥、吐谷浑等少数部族反复占据,甘肃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在中唐河湟地区陷落后更加明显。诗人王建《凉州行》^{[4]3374}在表现凉州等地陷落吐蕃后云:“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说明吐蕃占领河西后,汉人与蕃

人通婚,蕃人不仅开始穿汉人的锦衣,还开始学习耕种。除了蕃人开始汉化外,汉人也开始逐步融入吐蕃人的生活,晚唐杜牧《河湟》^{[4]5951}诗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表明此时河湟地区的汉族百姓不仅已经穿胡服,还参与游牧生活,这是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互融的结果。

这种互化还体现在汉人生活用具、服饰的显著变化上,如源自古罗马(大秦)、经丝路传入的地毯——“氍毹”,早在盛唐时期就已传入甘肃,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之“织成壁衣花氍毹”、《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之“高堂满地红氍毹”就曾两次提及。到了中唐,随着吐蕃占领河湟,普通汉族百姓服饰变化更趋明显,与蕃人一样披发、穿毡裘。唐德宗贞元年间,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诗人吕温行经河州(今甘肃临夏)时,就有“谁怜被发哭东流”句(《题河州赤岸桥》^{[4]4166})来形容当地遗民们披散着头发的异族打扮。十才子之一的耿漳《凉州词》^{[4]381}云“毡裘牧马胡雏小”,可见中唐时凉州附近的百姓已着毡裘驱牧马了。由于蕃地苦寒,人多着皮裘,白居易《缚戎人》^{[4]4698}中“家本凉原”(今甘肃平凉、宁夏固原一带)的主人公,“遣着皮裘系毛带”就是典型的蕃人打扮,元稹《缚戎人》^{[4]4619}亦云此人“连头尽被毡裘喝”,这些都与中原汉人的服饰截然不同。吐蕃占领河湟地区近百年,汉人除了服饰发生变化外,语言也有改变,据前王建《凉州行》可知蕃人开始学说汉语,而从晚唐司空图《河湟有感》^{[4]7261}中感叹“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便知汉人已经会说吐蕃语了,这是典型的胡汉互化的体现。

此外,由于长期地处边塞,再加上丝绸之路上往来的游牧民族粗犷民风的影响,甘肃自古民风质朴,人多尚武,到了唐朝,甘肃仍然是丝路咽喉、边塞要冲,尚武风气不改,这在边塞诗中多有体现。王维出塞至凉州曾作《凉州赛神》^{[4]1308},诗云:“凉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峰头望虏尘。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表现了凉州军中祭祀越骑神的壮观景象,也展现了河西尚武的一面。杜甫《秦州杂诗》其三^{[10]574}亦有“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之语,来表现临洮少年自夸勇武的情状。中唐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4]5876}云:“玉关西路出临洮,风卷边沙入马毛。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院无竹树,壁挂弓刀,更是典型的民间尚武风习的书写。

4.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往来和繁华都会书写

除以上外,由于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丝路的商贸往来情况在唐人描写甘肃的边塞诗中也有直观的书写,最典型莫若张籍《凉州词》^[4]⁴³⁵⁷,其一云:“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此诗表现的正是盛唐时代的凉州丝路商旅不绝的通商盛况。在唐代,地处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在中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外使节、客商聚居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而河西、陇右三十三州中最大、最富庶的凉州作为陇右重要的都会,更是丝路重镇。《通典》卷七载:“西至蜀川(今成都)、凉府(凉州,今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17]¹⁵²,足见其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重要的枢纽作用。

此外,唐代的敦煌是一座国际化的商业都市,设有供胡商贸易的“市”,敦煌以西百里的兴胡泊,则专供通过玉门关往返的胡商居住,敦煌的“市”外来商品极为丰富,这在敦煌遗书中便可见到。敦煌遗书有记载:“某乙铺上且有:桂皮胡桃瓢,梔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苜蓿苜蓿,芜荑大黄;油麻椒秣,河藕弗香;甜干枣,酸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秣皂髻,紫草苏芳。沙塘吃时牙齿美,饴糖咬时舌头甜。”某乙铺中来自南北的干果、药材、调料、服饰应有尽有,反映了敦煌

对外贸易的范围之广,充分体现了敦煌的繁华以及丝路贸易的繁荣。

三、结语

丝绸之路的畅通、国力的强盛、文化交流的频繁,拓宽了唐人的视野,加速了人物的流通,出塞的诗人们行经甘肃,留下了大量动人的诗篇,全面记录了甘肃大地的戈壁大漠、名山大川、独特气候、特有物产,为后人研究甘肃地理景观、气候物产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处于丝路东段沿线的甘肃,在唐人西北边塞诗中就集中凸显了此地多民族和谐共存、多元饮食娱乐文化生活繁荣、边塞尚武风气盛行等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其中许多生活模式、风气习俗绵延至今,这对研究甘肃地域文化的前后传承和延续大有裨益,值得相关问题研究者重视和关注。当然,由于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当时重要的战略要地,为争夺西域控制权,唐与吐蕃、西突厥、吐谷浑的战争频发,这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的问题作者另有《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所涉河陇重大边事书写》^[18]一文加以论述。

参考文献:

- [1](五代)刘煦.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清)彭定求,沈三曾,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5](清)董浩,等. 全唐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7]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8]岑仲勉. 隋唐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9]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胡大浚. 唐代边塞诗选注[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

- 社,1990.
 [12](唐)韩愈,著. 马其昶,校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唐)高适,岑参,撰. 高文,王刘纯,选注. 高适岑参选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4](宋)王溥. 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美)谢弗,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吴玉贵,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6]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7](唐)杜佑. 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田玉芳. 丝绸之路上的唐人边塞诗所涉河陇重大边事书写[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6):1-8.

(下转第103页)

Alie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Theory

Huang Xiaobin

(Faculty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is one of the concret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a series of alienation problems are easily caused by the ambiguity of the boundar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terest,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the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auses of the alien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mainly fall into two aspects: the lack of norms of the institutional boundary and the lack of constraints of the spiritual boundary. Therefore, by improving the norms of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system and advocating teachers' conscious restraint, a clear boundary is constructed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alien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 increment of knowledge value of college teachers.

Key words: colle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affiliation; boundary theory; alienation

~~~~~  
(上接第 78 页)

## **The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ms on the Silk Road's Writing About Gansu**

Tian Yufang

(Business and Media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Silk Roa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and passage from China to Europe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 large number of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ms depicted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along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Gansu, and comprehensively recorded the Gobi Desert, famous mountains and rivers, unique climate, specialties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people's lives, especially in Gansu, along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frontier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focused on the multi-ethnic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pluralism in this place. The prosperous features such as the prosperity of the food, entertainment, culture, life, and the prevailing courageous customs of the border residents were also portrayed, which highlighted the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of Gansu.

**Key words:** the Silk Road; Tang Dynasty's frontier poems; Gansu; writing